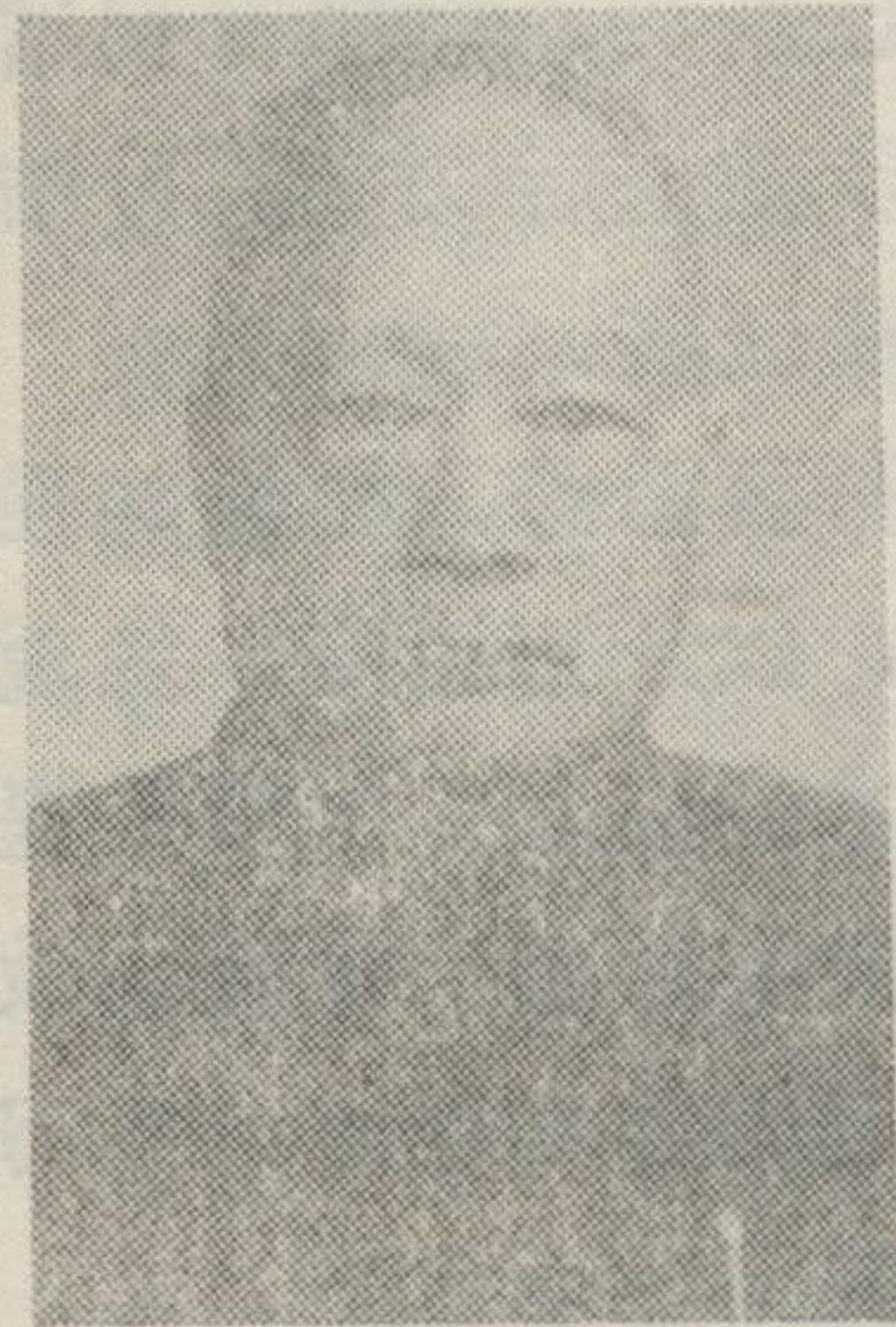


著名流行病学专家——蒋豫图教授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马 静



蒋豫图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流行病学家，对我国、我军流行病学和军事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丰富的学术思想、执着的追求精神、实事求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流行病学界的宝贵财富；他酷爱学习，追求真理和为流行病学发展奋斗不息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

蒋豫图教授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攀登着科学高峰，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人生的价值。

他1913年4月8日生于河南开封。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三年后入协和医学院。1939年毕业，获燕京大学理学士和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协和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两年转入公共卫生系作助教，直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占领协和医院。而后，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自己开办了景山医院，任院长，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46年又回到协和医学院，在公共卫生系任助教，边教学，边学习了西方有关公共卫生学方面的先进理论和实践。1947年2月由于他帮助过共产党和解放军，曾受过国民党特务的拘留。1948年晋升为讲师并被协和医学院派送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主修流行病学专业，1949年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是当时获此学位为数不多的华人之一。丰

富的经历和系统的理论，为蒋豫图教授热爱并终生致力于流行病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3~4月，霍布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Moore教授留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给予奖学金。但他得知北京、上海已经解放，心中非常高兴。由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崇敬，使得他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个新中国一定会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从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光明的前途。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使他下决心要为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婉言谢绝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登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949年8月，他终于回到了祖国，并幸运地赶上了开国大典，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时代的最强音，使蒋豫图教授激动不已，更坚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致力于发展中国人民的预防医学事业的决心。1950年7月他晋升为副教授，同年12月，蒋豫图教授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更加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科学技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兢兢业业实践着自己既是科学家更是共产党员的追求和奋斗目标，即使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也毫不动摇。

1956年，国家抽调一批科技骨干加强军事医学事业。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把自己紧紧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蒋豫图教授，欣然从协和医院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此全身心地致力于军事医学事业，发展军队流行病学。

治学严谨 事业为重

蒋豫图教授一生最反对弄虚作假，崇尚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学风严谨，作风踏实。只要有可能，总要设法亲临现场指导或参加工作。在他看来，不愿深入现场，吃不了苦的人，做不好流行病学工作，也不会得到可靠的结果。40年来，祖国的边防海岛、热带丛林、西北高原、塞外峻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次接到任务，无论多么紧急，他从不推托，立即整装出发，有雷厉风行的作风。1953年，在越南北方解放区培训卫生防疫人员；1956年，在东北参加过军事演习和我国北方火箭基地周围地区的自然疫源性疾病调查；1958～1959年，参加中苏协作，在苏联加里宁地区和我国东北地区调查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发现中朝边境地区斑疹伤寒（虱传）在该地区呈地方性，一旦有新的人群进入，即会发生流行；1961～1963年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霍乱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研究；1964年参加了越南、老挝等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发现越南有恙虫病存在。1965年参加组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任副所长和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承担“三北”地区自然疫源地调查的组织工作和防生物战医学的研究。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仍然注意捕捉每一个机会，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在这期间，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完成了多项为部队平、战时服务的科研项目和任务。在工作中蒋教授深深体会到疾病信息和医学地理，对部队平战时卫生决策和措施制定与评价的重要性，他在注意追踪国内外进展的同时，与其他人员一起，组织编写了全国分省的《流行病学与医学动物》系列丛书。60年代第一版印出，70年代又予以修改补充，出版了第二版，为我国国土流行病学提供了较全面参考资料。

蒋教授的治学严谨还表现在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从不放过任何疑点，即使是“权威”或已公认的意见。原来，人们认为中国最

后一例天花病人是在1960年，并记录进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文件。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天花消灭委员会”顾问的蒋教授，对此有疑问，坚持带领同事对60年以后发生天花的情况做了调查核实，提出最后的天花病例的准确时间。在科技成果评奖和论证中，他同样一丝不苟，据理力争，不随声附和。某部一项细胞培养分离病原体的科研项目，众人已点头，但他看到结论尚有疑点，坚持要进一步验证后才能下结论，不久他的观点就被实践证实。

蒋豫图教授注意活跃科研思路，提倡加强学术交流和研讨甚至争论，以开拓思路，发现问题。为此，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多次带头提出问题，引导讨论。蒋教授本身也在科研、教学和为部队服务中丰富自己的学术观点，学习和应用新概念和新技术，提高学术水平。

50～60年代，传染病严重威胁着人群健康，是疾病防制的重点。蒋教授为此亲临现场调查研究，为部队，为群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70年代病毒性肝炎对部队健康的危害和国外的研究日益引人注目。为了解弄清病毒性肝炎的流行规律，蒋豫图教授认识到只用过去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已经远远不够，必须要加强实验室和检验技术的建设。自70年代末期至现在，在他带领和指导下，已形成了一支对病毒性肝炎能进行较全面研究、掌握先进技术的科研队伍。对病毒性肝炎进行了从流行病学到分子生物学的多方面研究，并取得了多项成果。

刻苦学习 不耻下问

提起蒋豫图教授的嗜好，可以说是唯有读书。拿起书本，他几乎可以忘记一切。他读书的特点可以说有三个，一是专心，二是随手记录，三是注意消化吸收。蒋教授读起书来，无论严寒酷暑，也无论环境安静还是嘈杂，一坐就是半天，常忘记下班回家。时间长了，同事们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都要去“关照”他一下。蒋教授在读

书时，注意思索，随时核算数据，随手用英文记笔记，从不间断。有时为了一篇文献，一本新书，他四方询问追求，不到手绝不罢休。遇到问题，他总是虚心求教，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自己的学生，也不例外。他这种勤于学习，精于思索，不耻下问的精神，极大地感染和带动了他的同事和学生。

蒋教授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又红又专。专业书刊文献他认真读，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和各种学习材料，他也以共产党员的忠诚同样认真阅读、理解和掌握。在工作、生活中，公私分明，遵守纪律，不搞特殊。

令人难忘的是，在1991年初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遭遇了失去多年相濡以沫的亲密伴侣、家中遭火灾、本人又患重病的一连串打击。领导和同事都不禁担心他能否承受得住，但人们见到的却是他在病榻上戴着花镜，吃力地读书的形象，大家被深深地感动了。都劝他注意休息，不要过累。他平静地回答：“学习和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现在我不能工作，但可以学习。读书是我最好的精神寄托，否则，我将陷入痛苦之中。”老人一片肺腑之言，使大家肃然起敬。

蒋豫图教授正是用这种生命不息，攀登不止的精神对待自己所奋斗一生的事业。年近八十高龄，仍念念不忘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积极倡议办现代流行病学培训班，为军队培养一批流行病学工作骨干，亲自起草报告和教案，并一再表示要亲自授课。从他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老一辈科学家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和宏大的理想抱负，真可谓老骥伏枥，志仍千里。

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

蒋豫图教授的认真和严格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他的同事、学生甚至领导都深有体会。因为他知识渊博，和对每位求教者都认真对待，真心帮助，从不敷衍了事，所以经常有人向他求教。凡经他审阅的稿件、论著，从立论、设计、材料方法选择到结果分析，无一不仔细推

敲，表格数据，一一核算，文字甚至标点符号也从严掌握。无论是审稿还是当面请教，他都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言词较为尖锐，使人当面受不了，但过后思考感到受益匪浅。

恢复研究生制度以来，蒋教授带出了6名硕士生，7名博士生，带出了一支研究生培训小组。在带教中他既提出问题，悉心指导，把握关键，又要求研究生们独立思考，学会动手动脑解决实际问题，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蒋教授既教书，又育人，注意抓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广阔胸怀和良好作风，不断克服缺点，做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现在他的学生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力量。从自身和国家发展的经历，蒋教授深深体会到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科技对促进和提高国内科技水平的重要性，他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扶持青年博士，积极创造条件支持他们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出国深造。

蒋豫图教授从事军事医学40年以来，担任过众多职务，组织和参加了多项科研项目，获得过许多成果的荣誉。只要工作能上去，蒋教授从不计较将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显示出一个科学家、学科带头人长者的风度。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以来，蒋教授担任过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顾问、流行病研究室主任、院专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名誉顾问；军队流行病学专业组组长、顾问；国际流行病学协会会员；被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天花消灭委员会”顾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副主编；《中华预防医学杂志》、《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等杂志的顾问；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和“生物武器医学防护”分册的主编，是“军事医学”分卷的编辑之一。编审、编译和审校过多部著作，如“霍乱”、“AIDS”等，为流行病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是军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项目的主要组织负责人之一，被国家和军队列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载入《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四卷。